

通向未来之路

中国现代化目标模式沉思
河北人民出版社



翁寒松 著

马克思主义和

当代现实

MA K E SI ZHU YI HE DANG DAI XIAN SHI GONG SHU

通向未来之路

中国现代化目标模式沉思

翁寒松 著

《马克思主义和当代现实》丛书

特邀顾问（以姓氏笔划为序）：

邢贲思 宋 涛 陶大镛

特邀编委（以姓氏笔划为序）：

卞兴华 王 于 王 东 王锐生

何君康 胡光代 项启源 赵家祥

黄达强 蔡声宁 魏 埏

编委（以姓氏笔划为序）：

许爱仙 张 驰 李保平 何瑞桐

通向未来之路

翁寒松 著

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石家庄市北马路45号）

河北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河北省新华书店发行

850×1168毫米 1/32 7.375 印张 183,000 字 1988年11月第1版

1988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 定价：2.65元

ISBN 7-202-00251-5/B·28

在丛书林立的今天,《马克思主义和当代现实》丛书和读者见面了。

这套学术理论丛书力求以对当代现实问题的严谨探索为特色。

马克思主义是在历史和科学的前进中不断丰富和发展的科学,它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中国和世界已经和正在发生的巨大变化,一方面证明马克思主义的伟大生命力,一方面要求我们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创造性地解决新问题。新时期我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的任务,就是要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各方面,研究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全面改革的新情况、新经验、新

编者

前言

编者

前言

问题,探索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规律,同时要研究当代世界的新变化,研究当代各种思潮,批判地吸取和概括各门科学发展的最新成果。只有从实际出发,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勇于突破那些已被实践证明是不正确的或不适合变化了的情况的判断和结论,而不是用僵化观念来裁判生活,马克思主义才能随着生活前进并指导生活前进。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和方法研究当代现实,从当代中国和世界的现实出发,充实、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是新时期我国理论工作者的重心所在。《马克思主义和当代现实》丛书将为此尽力。

她将着意寻求那些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

理，从哲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法学、史学、文化学等领域研究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中出现的新情况，从理论上提出问题、解答问题的作品。

她将着重寻求那些深入研究当代科学技术革命、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当代社会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新变化，视野开阔，勇于突破，富有启发性的作品。

她也将寻求那些材料充分，以理服人地评析当代西方各种有影响的理论思潮，具有独到见解的作品。

她还将外国学者（首先是马克思主义学者）研究马克思主义和当代现实问题的佳作纳入自己的视野，为我国理论工作者了解、借鉴国外研究成果提供便利。

她注重学术著作的可读性，力求语言清新，文字洗炼，材料扎实，观点鲜明。

马克思曾经把科学的入口处比作地狱的入口处，以此提醒科学工作者的探索勇气。自古及今，充满探索勇气的作品无不使人耳目一新，活跃人的思路，启迪人的智慧。理论研究中的见仁见智和自由争论，是走向真理的必由之路。我们的丛书，并不是要叙述什么绝对正确的东西，而只是反映对真理的探索和追寻。倘使她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我国理论工作者研究当代现实问题的水平，我们将十分满足。

丛书的组稿工作从一开始就得到了许多学者的支持。热切希望能得到更多学者的帮助。对于所赐书稿，我们将不计作者名声之大小，年龄之老中青，一律视选题和书稿质量决定取舍。

我们衷心希望这套丛书能奉献给读者有益的思想，衷心希望这些凝聚着作者辛勤探索心血的著作，能因它们从不同侧面反映着现时代而具有长久的价值。

《马克思主义和当代现实》丛书编委会

1987年6月20日

前 言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国各族人民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核心，展开了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的伟大实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进入了一个全力以赴加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崭新历史时期。在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导下展开的社会主义体制改革，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注入了新的活力。在这样一个历史时期，尤其是在现今的“改革”阶段上，哲学理论工作者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对我们所进行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进行深入的哲学思考，即以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作为研究的客体，从哲学理论的高度阐发这一运动的含义、性质、内容、战略和方针方法等等，从宏观的角度回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这一工作的目的在于，以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际相结合的努力，有效地发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观、方法论功能，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对实践过程的思想指导，推进运动的自觉发展，同时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这既是时代提出的任务，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性质的要求。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体制改革的深入发展，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进行哲学思考的重要性和迫切性，更加突出地表现出来了。实践已经证明，改革，乃至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运动，并不是某种单纯的经济过程或政治活动，而是一个包括了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的多层次、多方面的综合性实践过程。因此，历史学的、社会学的、政治学的、经济学的乃至一切具体科学的研究成果，都不能

取代哲学所要进行的工作；只有对运动过程的名副其实的哲学思考，方有能力解释运动过程中各个层次、各个方面之间的交叉过渡、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的相互作用、甚至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含义本身等等。也只有当哲学对这些问题作出科学的解释、从而精神地提供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总体目标模式等等时，才能统一起全国人民的意志，振奋起他们的高度自觉精神，引导他们向着业已观念地把握了的未来挺进。反之，以有限的知性思维、形而上学的非此即彼的满足来把握错综复杂的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问题，必然会因蔑视辩证法而受到惩罚，不但难以卓有成效地推进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而且往往会对这种发展设置出重重障碍。

实践中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都充分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中充当革命先导的重要性。而这种证明也折射了“哲学思考”工作本身的成败得失，反映出了对“哲学思考”本身进行哲学思考的必要性。这意味着“哲学思考”的工作也要以科学的方法论为指导，防止和克服名义上的“哲学思考”，实现名副其实的“哲学思考”，从而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真正的、有效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指导。这一问题是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固有本质和崇高尊严的要求内在地联系在一起的。

从当前实际情况来看，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进行哲学思考的主要课题之一，在于哲学地揭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含义本身和目标模式（而这两个问题是内在联系、相互包容的）。只有较好地解决了这个课题，才能真正树立起“现阶段我国各族人民的共同理想”（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决议”），才能使我国人民在当前实践中自觉地处理好理想与现实、获得与代价、短期目标与最高价值等一系列微妙复杂的关系问题，才能以科学的战略指导方针和战术实施方法把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推向新高潮。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章 导论	(1)
第一节 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含义	(1)
第二节 从哲学角度思考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问题的方法论原则	(26)
第二章 中国现代化目标模式的理论依据	
——马克思主义的人的全面发展观	(40)
第一节 自由是人的全面发展的实质	(41)
第二节 实践主客体的动态统一是人的全面发展的社会表现形式	(45)
第三节 “美的规律王国”的占有是人的全面发展的历史确证	(49)
第四节 人的全面发展的历史演化和最终实现的客观依据	(54)
第五节 社会主义开辟了加速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坦途	(62)
第三章 全面发展新人的雏形——发达社会主义新人	(71)
第一节 发达社会主义新人的本质规定性	(73)
第二节 发达社会主义新人的形式规定性	(97)
第四章 发达社会主义新人的集团规定性和社会总体规定性	(114)

第一节	发达社会主义新人的集团规定性·····	(115)
第二节	发达社会主义新人的社会总体规定性·····	(121)
第五章	以“总和”形式凝结在新人品质中的现代化	
	社会主义中国社会关系(一) ·····	(132)
第一节	现代化社会主义中国的社会活动方式·····	(134)
第二节	现代化社会主义中国的政治生活方式·····	(144)
第六章	以“总和”形式凝结在新人品质中的现代化	
	社会主义中国社会关系(二) ·····	(167)
第一节	现代化社会主义中国的管理方式·····	(169)
第二节	现代化社会主义中国的生产方式·····	(183)
结束语 ·····		(215)
后 记 ·····		(227)

第一章

导 论

第一节 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含义

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是我国人民当前的崇高奋斗目标。明确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含义，亦即明确我们当前奋斗目标的内容实质，是统一全国人民的思想认识和行动步伐，提高行动的自觉性，确保激情的科学性，以及在行动中运用正确的手段和方法的基础。迄今为止，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含义似乎是不言而喻、众所熟知的。但是，“熟知并非真知”；从实践中存在的大量模糊认识来看，对于把握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含义的问题，还需在理论上做出艰苦的努力。例如，在“四化”建设实践中出现的过分崇尚西方道路的不切实际的思想观点，有时并非由于敌视社会主义制度或鄙薄民族文化之故，而往往是由于在未能深刻理解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含义的情况下，急于改变中国贫穷落后面貌的情绪所使然。解决这类模糊认识问题，将偏激了的爱国热情等等引导到正确轨道上来的重要一环，便是从理论高度明确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含义。

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含义，包括以下三个基本内容：

一、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中国现代化的唯一途径

现代化首先是一个普遍的概念，表明人类这个唯一具有无限探索精神和无限创造才能的物种，在无限上升发展的变革对象世界的实践中，永无止境地把社会的物质生活和精神文化生活推向更高级的形态，永不停息地在对象化自己的本质的过程中力求全面实现自己的本质。现代化的这一含义，与人类社会历史的不断上升发展性质、人类追求社会进步的共通的和永恒的愿望内在相联系在一起。中国的现代化这一概念，首先就表现为这种人类特性在中国这块古老大地上的具体化；中国的现代化，就是人类不断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迈进过程中的一个具体内容构成。

现代化同时又是一个历史的概念。广义地说，它的概念内涵就是一部人类发展史，表明着人类如何从蒙昧走向开化，又如何从“物的依赖关系”走向“人的全面发展”。狭义地说，现代化主要是指工业革命以来、世界连结成一个综合地普遍联系的“地球村”以来的人类社会文明的发展。而这就意味着现代化的标准是一个具体的、历史的尺度，即人类发展的某一历史阶段上的社会文明的相对高度。与现代化的这一含义相联系，中国的现代化是指帝国主义列强用舰炮轰开闭关自守的中国大门以后，有良知的中国人力图改变中国贫困落后、被动挨打的状况，力求在世界民族之林树立自尊自强地位的努力过程。正是在这一努力过程中，中国人民逐步摸索到了一条实现中国现代化的现实道路，从而使中国现代化实践不仅因不同历史时期的世界标准而区分出量上不同的阶段，而且因展开方法的不同（以及相应的目标内容的升华）而区分出质上不同的形式和内容。因此，理解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含义，首先须将问题置于我国近代史的一般发展中，来把握中国现代化的现实可能性和展开了的现实。

1840年，鸦片战争的隆隆炮声，划破了中国封建社会的苟且偷生的“宁静”，粉碎了封建统治者“长治久安”的迷梦。经过冷兵器对“船坚炮利”的以卵击石的较量，大清帝国愚昧无知、夜郎自大的尊严被无情地“褻渎”了，“泱泱大国”的门户被迫洞开了，“祖宗之法”再不能奉若神明，封建的专制政治统治及其自然经济基础都开始动摇，中国变成了帝国主义列强的商品市场和原料产地，沦为不伦不类的半封建性的半殖民地。面对这一严峻事实，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的近80年时间里，先进的中国人曾经不辞千辛万苦，努力向西方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封建统治集团内部的一些代表人物，出于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继续压迫人民的目的，也多少抛开了“非礼弗视”的祖训，把眼光转向了西方。所有这些便统一地形成了中国早期的现代化运动，展开了中国现代化的历史。

首先是清政府在太平天国革命和英法联军入侵双重压力下采取“两害相权取其轻”的策略、在19世纪60年代开始的洋务运动。这种旨在维护封建统治阶级自身利益的运动的要义在于：“查治国之道，在于自强，自强以练兵为要，练兵又以制器为先”（李鸿章语）。也就是说，洋务运动的根本目的在于师“船坚炮利”以制民，在政治上是反动的。但是，它毕竟开始学习和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如派遣留学生、雇请外国工程技术人员）和发展近代工商业（如使用机器，开矿办厂），在客观上顺应了中国自乾嘉以来业已萌芽的资本主义发展趋势，在事实上也有破坏封建小生产的经济格局、刺激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的功效。此外，洋务运动也没有完全舍弃“师夷之长以制夷”的信念，即没有完全丧失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志向。因此，洋务运动在一定意义上，堪称开中国现代化运动之先河。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洋务运动自身分化出了超乎其要旨和方法的资产阶级改良派——他们指责洋务派“徒袭皮毛”，提出“开矿务以来煤矿五金”、

“制机器以兴织造”、“许民间用轮船以达内河”、“立公司贸易于外洋”，要求政府重视发展民族资本等等——的事实中得到某种证明，因为这表明了洋务运动与后继的现代化进程的客观连续性。

然而，无论是洋务派的洋务运动，还是从它那里分化出的改良派的变法维新，都带着一种天真的疑惑和廉价的遗憾在中国失败了。洋务运动出于维护封建统治的目的，以逆历史潮流而动之心行国家“上进”之道，以本末倒置的鼠目寸光瞩目于用银两采购撑撑门面的洋枪洋炮铁甲舰，表面上轰轰烈烈一阵，却未改变中国政治、经济的经络骨骼，也不可能把人民调动成同心同德的大军。加之封建统治集团昏庸无能之辈云集，励精图治之心鲜有，格物致知之力不存，贪污受贿之风盛行，结果不是“以中国造船之银，倍于外洋造船之价”（李鸿章语），“只能靖内匪，不能御外侮”（丁日昌语），就是“机器局管事一年，终身享用不尽”，没有不败之理。资产阶级维新派，虽然通过洋务派的作为、贪污成性的封建官僚以办洋务、自强之名，行中饱私囊之实，以及毫无效能的封建衙门根本上是实施近代经营管理的障碍等事实，认识到洋务派的所谓“官督商办”实质上是套在近代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上的上层建筑枷锁，从而从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工业技艺进展到学习其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要求改革封建专制制度和制定资产阶级性质的法律。但是，资产阶级改良派既无力越过封建统治集团的“法统”雷池一步，又面临着“不让阿Q革命”的“真洋鬼子”；封建专制主义顽固派“守旧，恶西学如仇”，且又有支持其守旧的强大政权手段和世俗基础；帝国主义列强只存奴役劫掠中国之心，断无纵其羽翼丰满之念，它们的经济实力和军事手段，随时用来削弱中国国力之基础。处于这种腹背受敌、进退维谷境地的变法维新，当然也没有不败之理。真实的历史结局是，洋务派用白花花的银子买来的“现代化”，随着北洋水师葬身黄海而失去了存在的象征；维新派的戊戌变法，不过“百日维新”，便落得个光

绪瀛台幽禁、康梁亡命东瀛、六君子身首分离。中国非但没有实现现代化，相反却被帝国主义列强用更现代化的“船坚炮利”强使割地赔款。到1894年，在中国本土的产业资本中，外国资本占了60.7%，完全控制了中国的经济命脉。中国现代化的尝试在封建专制制度和帝国主义列强的重轭下失败了，中国的殖民地危机加深了。

以孙中山为代表的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也为中国的现代化而不懈的努力。在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中，中华帝国惨败给从未认真重视过的“小小的日本”，丧权辱国之甚，割地赔款之巨，令每一个中国人深感民族危机之严重。与救亡图存的爱国心相联系，有识之士的现代化意识更为加强了。由于倍感帝国主义的压迫和腐朽的封建统治致使中国虚弱不堪、任人宰割，反帝反满便成了20世纪初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战斗口号，孙中山将其概括为“民族主义”。与此同时，孙中山还提出了以“平均地权”、“节制私人资本”和“发达国家资本”为内容的“民生主义”，以及具有鲜明的近代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民权主义”，从而构成了著名的旧“三民主义”，亦即资产阶级民主派力图以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方式铲除封建制度、使中国走向现代化的纲领。

处于这一历史阶段的先进的中国人，在对现代化的理解、认识方面超过了他们的前人，这就决定了他们实现现代化的方针方法的历史进步性。孙中山提出的旧“三民主义”，反映了资产阶级革命派业已认识到，现代化是不可能在旧法统的框架内花钱“添置”成的，它是一个包括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和国民意识的变革在内的综合性的革命。尤为可贵的是，这一时期的革命者，已认识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并不就是中国现代化的全然楷模。他们看到了“文明越发达，社会问题越著紧，……英国财富多于前代不止数十倍，人民的贫穷甚至比前代也不止数千倍。并且富者极少，贫者极多”（孙中山语）；“文明有善果，也有恶果，须要取那善

果，避那恶果。欧美各国善果被富人享尽，贫民反食恶果，总由少数人把持文明幸福，故成此不平等的世界。我们这回革命，不但要做国民的国家，而且要做社会的国家，这决不是欧美所能及的”（孙中山语）。无论是主张维新的康有为，还是主张革命的孙中山，在以西方资本主义方式作为疗救中国的药方的同时，都竭力想防止资本主义的弊病在中国发生。例如，孙中山在制订《实业计划》时提出：“中国实业之开发，应分两路进行：（一）个人企业，（二）国家经营是也”；“中国要解决民生问题，想求一劳永逸，单靠节制资本的办法是不足的……还要靠发达国家资本。”^①之所以强调用国家的力量、以发达国家资本的方式去实现现代化，一方面是因为帝国主义列强“不至于笨到这种地步：实行商业的自杀，来帮助中国拥有自己的工业威力而成为独立的国家。……他们的利益首先在于使中国永远成为工业落后的牺牲品。”^②因此，须以国家资本取代占中国近代产业资本四分之三的外国资本，改变经济上受钳制的地位，实现中国自己的现代化。另一方面，既然近代中国的资本原始积累和资本的集中是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下进行的，没有获得独立和正常的发展，因此，私人资本先天不足，后天不顺，不仅担当不了抗衡外国资本的任务（孙中山说过，“中国之实业，即在中国境内，犹不能与外国资本竞争。”^③），而且也不足以为中国现代化事业提供“一定的最低限额的货币或交换价值”^④。在这种情况下，“铁路、电气、水道、大矿山、钢铁、大机械”等“关键及根本工业”，皆难以进行造就，所以需要以“发达国家资本”的国家资本主义方式遂行现代化工程。值得注意的是，上述思想的实质，也包含了以国家

① 《孙中山选集》上卷，第191页；下卷，第802页。

② 《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332页。

③ 《孙中山选集》下卷，第522页。

④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9章。

力量来防止或减轻贫富不均等资本主义弊病的内容。所有这些，都标志着中国的现代化运动在方针内容方面进入了一个质上更高级的阶段。

但是，这种在当时堪称先进的、以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遂行现代化工程的方案，在中国的实际生活中却处处碰壁。在封建小生产的汪洋大海之中，帝国主义列强的阴影自不待言，地主阶级的巨舰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狂轰滥炸，农民小生产者的采菱船星罗棋布地看热闹，本没有、也不可能有多少资产阶级革命的兴趣，软弱的中国资产阶级近乎“跪着造反”，不免还是要依附于封建统治集团。因此，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无论是干革命还是办实业，真正轰轰烈烈的多为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批造反秀才的热热闹闹。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就革命而言（这是政治现代化的内容），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宣统帝，但绝大部分权力却落入了封建军阀、官僚和立宪派手中，“旧巡抚穿上了新都督的外衣”。到袁世凯当政时，封建法西斯专政将民主不知扼杀到何种地步，甚至司法活动，也一切均可“便宜行事”。辛亥革命失败了，中国仍然是帝国主义列强压迫下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革命尚未成功，建设也无从谈起。孙中山本人就沉痛地说过：满清王朝被推翻以后，“官僚之流毒日益加甚，破坏虽成功，建设上却一点没有尽力”；“政治上、社会上种种黑暗腐败，比前清更甚，人民困苦，日甚一日。”正是由于这些情况，尤其是深感帝国主义列强在经济上（不予贷款）和政治上（不予承认）决非“平等待我之民族”，孙中山把目光转向了苏维埃，提出“中国革命非以俄为师断无成就”，从而逐步将旧“三民主义”发展成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新“三民主义”。在此前后，在“阿美乐尔”号的炮声召唤下，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一批先进的中国人，包括曾经主张“建设西洋式之新社会新国家以求适今世之生存”的陈独秀，也转而认为“共和政治为少数资本家所把持”，“要用它来造成多

数幸福，简直是妄想”，在中国，“我们倘能将俄国精神和德国科学合二为一，就用不着美国资本了。”这就表明，一批先进的中国人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转向了早期的共产主义者。而这就意味着我们中华民族即将告别“无数革命的先烈，为此而抱终天之恨”的“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反对中国独立，反对中国发展资本主义”^①的中国近代史，意味着中国的现代化运动将获得崭新的内容和真正的生命。

但是，正当中国现代化的发展出现了真正的契机的时候，同样是由于帝国主义及其中国代理人的强大、封建地主阶级的强大、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特别是由于近代中国无产阶级还不够成熟，业已获得了真实可能性的中国现代化运动尚不及展开其现实性，就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联合镇压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的腥风血雨中惨遭戕贼。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亦即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联合专政，在政治上具有极强的封建性和买办性，所代表的阶级利益极其狭窄，因而具有十分露骨的法西斯专制独裁性质。而这就剥夺了实现现代化的政治条件或现代化内容的固有组成部分。在经济方面，买办性的官僚资本主义是中国资本主义的主体，官僚资本是封建的买办的国家垄断资本，它占了当时整个中国工业资本的三分之二。但是，官僚资本不是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积累起来的，而是官僚资产阶级利用超经济的特权，主要在从事金融和商业投机的过程中、在掠夺广大劳动人民和兼并民族工商业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并且卵翼于帝国主义的势力。因此，官僚资本的发展，不等于中国独立的资本主义现代工业生产的发展，不等于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从实物的角度来看，它的发展也更多的是标志着中国日益沦为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原料、初级产品产地和外国过剩产品的倾销地。所

^① 参见《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640页。